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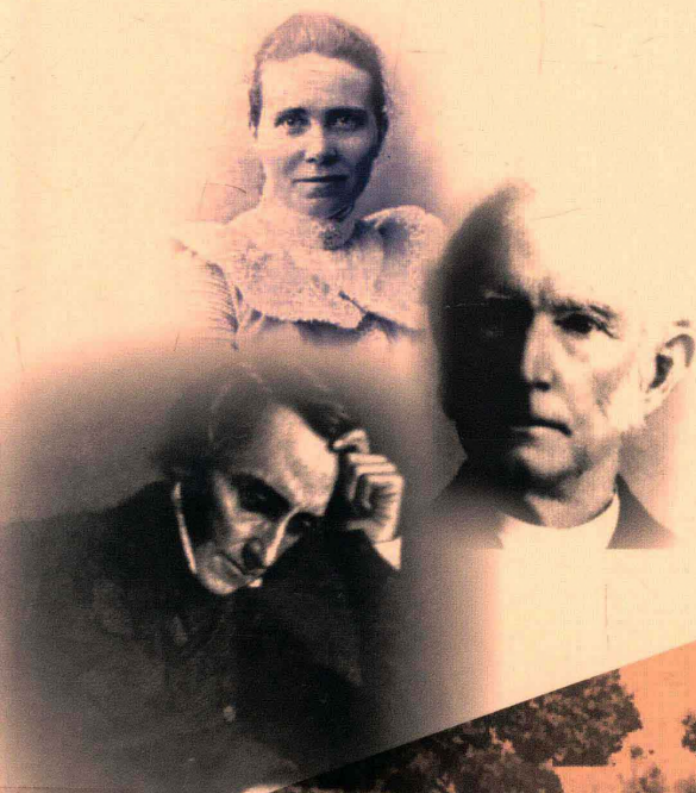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闽台区域研究论丛》 谢必震 主编

西方传教士与

晚清福建社会文化

吴巍巍 著



海洋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09YJC73000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闽台区域研究论丛》 谢必震 主编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 福建社会文化

吴巍巍 著

海洋出版社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福建社会文化/吴巍巍著.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1. 10
(闽台区域研究论丛)

ISBN 978 - 7 - 5027 - 8131 - 6

I. ①西… II. ①吴… III. ①传教士 - 西方国家 - 影响 - 社会发展 - 福建省 - 清后期 ②传教士 - 西方国家 - 影响 - 文化发展 - 福建省 - 清后期
IV. ① B979. 2 ② K29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9387 号

责任编辑: 张 荣

责任印制: 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旺都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20.75

字数: 390 千字 定价: 58.00 元

发行部: 62132549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在福建地方史研究的学术队伍中，不同的专家、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辛勤地耕耘劳作。吴巍巍博士正是这个研究队伍中的一名年轻学者。他独辟蹊径，选择了以往人们鲜少关注的“西方人眼中的福建社会”这一选题作为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并为此孜孜探索，用力甚勤。

吴巍巍博士是我在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指导的第三位博士研究生。他在硕士阶段主要从事福建基督教史研究，根据他的学术基础与研究旨趣，2006年开学伊始，我与他商定，以“近代西方传教士视野中的福建社会”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我则担负指导之责。

巍巍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资料搜集方面的用功程度与对史料的解读能力。由于他的选题主要是以外国人的著述、报告、书信、报刊等西文资料为基本史料，对外文尤其是古英语的掌握与解析成为开展论文的重点工作。可喜的是，巍巍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不仅“地毯式”地全面搜集这些西文材料，更从一开始就分门别类地摘译重要片段，作为其日后写作的基础史料，能够做好这一点实属不易。另一方面，在博士论文开展过程中，我也反复叮嘱巍巍要注意从福建地方史料的层面与西文资料互证互补，从而以一种“双重证据”的方法使论文观点更具说服力，在这方面，巍巍亦能够较好地做到中西史料的结合，通过查考大量福建地方文献资料，作为与西文材料互相补证的论据，言之凿凿，令人信服。

巍巍的论文在内容方面，有两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多学科的视野和研究方法；二是深入探究问题的治学思想。当下，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已经成为学界愈益遵奉的发展趋势，我们只有积极应对，才能有所作为、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事实证明，一篇好的论文往往是建立于多学科整合和研究的基础上。巍巍在其论

文中运用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东方学、比较文学形象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 with 理论进行诠释、分析西方传教士对福建社会的文化考察和审视活动，其论证是多层面而丰富的。不仅如此，巍巍的论文还深入地探究、剖析传教士构建福建社会文化形象的表现形式、时代特征与本质属性，以及传教士的认知背后所折射出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与传教士的心态、语境、思想等深层次的内涵。这些都表现出作者科学严谨的做事态度和锲而不舍的治学思想。

立意深刻与层次丰富是论文的又一方面特色。巍巍在文中采用微观描画的模式，善用西方传教士的资料作为学术资源，改变了以往宏观审视的套路，将晚清福建社会文化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下考察，取得更加生动、切实的研究结论，这是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应用，具有学术新价值。在全面廓清西方传教士视野下的福建社会文化之表现形态后，他还明晰地指出传教士著述文献对东西方世界产生的影响和效应，特别是为福建地方史提供丰富的史料资源，其大量图片和老照片还为福建史研究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记忆，由此也可见这篇论文的学术价值。论文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收集整理传教士对晚清福建社会的文字记录与图片报道，并对他们记录信息的真实性与扭曲性、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做了分析，得出合理的结论。

历史研究最忌讳妄加个人主观评断。巍巍的这篇论文较好地避免了这种错误，在论述时采取客观的立场，指出传教士对晚清福建社会文化的考察比较关注的是社会现实状况与身边事象，因此观察得细致而周全，但对闽文化深层内涵缺乏挖掘，而且在记述和认识上存在殖民主义的政治偏见和基督教文化优越感；认为传教士对福建社会的观察和接触是直观的、真实的，但从认知与表述看，又不乏扭曲或带有偏见。这种论证和评价是从大量事实中归纳出来，因而是正确的，有说服力的。另外，论文也具体分析了传教士对一些社会问题与现象的理解、表述或阐释出现误解、误读甚至扭曲、丑化原貌的情况，并指出其中的种种原因，还着重从传教士个人的文化素质、知识结构、立场、观念和心态等方面分析产生扭曲现象的原因，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客观和公允的。

巍巍勤敏好学，谦虚有礼，最可贵的是对学问的执着探索精神。他的博士论文经过两年多来的修订，较之原稿有了很大的改进；同时，他还承担了多项国家与部省级课题以及单位的科研项目。如今，这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书稿即将交付出版社出版，作为导师，很为他的成长感到高兴。祝愿他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是为序。

汪毅夫
辛卯金秋
于北京

目 录

绪 论	(1)
一、本书选题缘起	(1)
二、学术史回顾	(4)
三、基础资料介绍	(15)
四、研究方法 with 框架	(19)
 第一章 晚清西方传教士来闽传教与著述活动	(22)
第一节 差会的时代:晚清基督新教传教士入闽传教概况	(22)
第二节 西方传教士记述晚清福建社会之著述概介	(27)
第三节 小结	(39)
 第二章 西方传教士对晚清福建社会的文化透视(上)	(41)
第一节 静态景观:自然形胜与物质特征	(41)
第二节 地方政治体制与教育制度	(56)
第三节 社会经济与民众日常生活	(66)
第四节 突发与渐变:社会动态及变迁局势	(88)
 第三章 西方传教士对晚清福建社会的文化透视(下)	(99)
第一节 民间传统习俗:节庆、婚丧及其他	(99)
第二节 “异教徒”的“罪状”:地方陋俗事象	(114)
第三节 “偶像崇拜”的舞台:宗教与民间信仰	(132)
第四节 街头市井文化与民间口承文学	(155)
第五节 小结	(176)
 第四章 西方传教士对福建社会文化的形象建构	(179)
第一节 兼采并记:走进田野的“人类学家”及其微观细描	(179)
第二节 直观呈现:传教士著述中的图照佐证	(196)
第三节 客观记述:真实再现闽人社会生活场景	(213)
第四节 迷失与扭曲:传教士著述中的失实报道	(220)
第五节 小结	(228)

第五章 文化差异与影响西方传教士认知的因素分析	(230)
第一节 教育背景、知识水平及文化素质	(230)
第二节 西方中心观与文化本位主义之审视.....	(239)
第三节 普世主义:潜意识中的“救世”心态	(248)
第四节 “异教”形象塑造:对西方世界的舆论宣传	(254)
第五节 文化适应:侨居生活与地方情境化	(257)
第六节 小结.....	(263)
第六章 晚清西方传教士述闽文献的多重意义	(265)
第一节 对福建地方史研究的资料价值.....	(265)
第二节 对西方世界的多重影响.....	(274)
第三节 小结.....	(284)
结 语	(285)
参考文献	(289)
附 录	
附录一:传教士述闽主要作品一览表	(308)
附录二:近代来闽基督新教差会机构名录	(316)
附录三:其他西方人群体记述晚清福建社会的作品	(317)
后 记	(321)

绪 论

一、本书选题缘起

福建自古即是东西方互动往来的重要舞台,是西方接触并认识中国文化的前沿窗口。历史上,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荣发达曾吸引世界各国商人来此贸易、居住,福建也因此成为西方人游历考察的主要站点之一,当时著名的世界四大旅行家^①中就有三位曾莅临福建,并留有文字记录在案。明清时期,福建在中西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史上地位日重,葡、西、荷、英等西方殖民势力相继在东南福建沿海地区开展商业贸易、被誉为“西来孔子”的耶稣会士艾儒略与叶向高等晚明福建士大夫的交游互动、“中西礼仪之争”在福建引爆及由此导致的清廷禁教等等,这些都使福建成为中西物质与思想文化交流中备受瞩目的关注对象。总体来看,晚清以前西方与福建的互动交往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西方人对福建的认识也大多带着美好的语调和向往的情怀,从马可·波罗到清初天主教传教士记述福建的论著中,这种主流观念一直是牢不可破^②。

晚清以降,西方殖民列强用武力叩开了中国古老的城门,中国社会开始逐步

① 四大旅行家分别为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鄂多立克、尼哥罗·康梯,前三位都曾游历过福建(主要是泉州),并在其游记中记述了在福建的见闻和观察印象。有关内容可参见《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或《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② 笔者通过结合晚清以前西人记述福建的作品和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发现:宋元至清初西方人(特别是天主教传教士群体)对于福建的记载和认识主要在两大层面上进行。第一是在物质与制度文明层面的优越论,对福建及至中国景观、器物及制度等赞誉备至、推崇有加;另一层面则表现为精神信仰之“落后”,如批判闽人乃至中国人迷信偶像崇拜、“异教”色彩浓厚和记述诸如溺婴等社会陋习的存在等,不过这些“质疑”的声音并不占主导地位(一般篇幅都很少)。有关这方面历史文献主要可见《马可波罗行纪》、《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6册,张星娘编,中华书局1977-1979年版)、《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英]博克舍编著、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年版)、《中华大帝国史》([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8年版)、《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法]杜赫德编、耿昇等译,大象出版社2001、2005年版)等;学者研究情况可参考[美]麦克福著、金云铭译:《十八世纪前游闽西人考》,载《福建文化》第2卷第2期(总第33期,1944年6月30日出版)、林金水、谢必震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美]史景迁:《16世纪后期至今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载《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Vol. 1, Part III, “China”等论著。

沦为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地体系和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一部近代中国的屈辱史和血泪史也由此而生。因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近代的福建仍旧是中外关系史中的前沿阵地，首当其冲地再次成为中西文化的撞击点和交汇点。如英国迫使清政府对外开放的通商贸易五口中，福建就占据了两个；而林则徐、徐继畲、严复等近代风云人物“开眼看世界”与传播西学精髓的思想与实践，也正是在这里发生和发展……可以说，中国历史步入晚清之世后，福建再次被推向时代舞台的前头，承载着接收全新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重任。而正是在此时，西方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推进和世界性殖民扩张进程中积累起了文化优越论和自负心态，而中西之间原本平等交往的格局也已被打破。以此为基准，西人对华态度也发生根本性的转换。他们不再对中国钦羡不已，而是开始以一种蔑视和否定的视界来看待与审视中国社会^①，同样，他们也开始以这种眼光来打量福建社会。

19世纪中叶，基督教传教士凭着不平等条约接踵来闽。他们在福建宣播宗教的过程中，也传来了许多代表西方“新式文明”的产品，并与福建社会各层面发生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例如处理民教纠纷，创办教育、医疗、出版、慈善等社会事业等，对晚清福建历史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②。

而同样重要的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他们也承担了向西方世界传递福建社会文化各方面信息的任务和使命。西方传教士对晚清福建社会的观识和报道可谓不遗余力，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他们所关注的对象，大到福建的总况概貌、小至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他们对福建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景扫描和考量，可以说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的中西交往大潮，并形成了具有相当体系化的“福建印象”。林金水教授有言：“近代福建走向世界，还具体表现在西方人对福建的记载与介绍。这些记载和介绍，无论在

① 根据学者研究，实际上西方人从19世纪初（甚至更早在1750年前后）即已开始了这种认识观上的换位。英国学者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曾言：“19世纪初，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上一个世纪对中国的热情被蔑视所取代”（〔英〕雷蒙·道森著、常绍民等译：《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7页）；周宁教授也认为，19世纪西方塑造的中国形象“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异域——一个堕落的黑暗王国”（周宁编著：《2000年西方看中国》，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18世纪中叶西方的中国形象转型，不仅是一个世纪的‘中国潮’退潮，也是西方五个世纪持续不断地美化中国形象的大潮退潮。此后有关中国的负面形象逐渐成为主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第304页）；美国学者布卢（Gregory Blue）专论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传统社会也指出：“任何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的人，都会为西方19世纪中叶中国形象的突变所震惊。一时之间西方关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印象都发生了激进的彻底的改变”（引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第312页）；又如，美国学者伊罗生在《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和中国学者王立新在《试论美国人中国观的演变》一文中皆认为，1842—1905年美国中国观是一种蔑视、否定的基调，等等。

② 对此，前人学者已给予相当的关注和研究，如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黄涛：《大德是钦：记忆深处的福建协和大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皮春花：《教会医学与近代福建社会》（福建师大2007年硕士论文）；陈林：《近代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考略》（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崔军锋：《民国时期福州基督教慈善事业研究》（福建师大2006年硕士论文）等。

数量上还是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远远超过历代来闽西人所写的游记和报告。因而使西方对福建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这些材料一方面为列强侵略福建服务,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福建与西方世界的沟通和联系,同时也为今日学者研究福建地方史,提供了难得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①。林师所说的“西方人”主要包括传教士、外交官、商人、旅行者等西人群体,而实际上传教士在这些记述与介绍福建的西人群体中,可以说是最为用力和最具代表性的。^②

基于以上所述,笔者认为:对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记述与介绍福建社会的作品进行梳理,并由此审视传教士与晚清福建社会文化之间关系,不仅有助于深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内容,对于福建地方史研究也能增添一些新的考察视角。所以,对这一选题进行系统、专门研究,是一项颇有意义与价值的学术工作。更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宏观而言,就笔者视阈所及,对于晚清来闽传教士的著述活动及探讨传教士与晚清福建社会文化关系这一课题的研究,当前学界还缺乏系统的专论,是一个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③。因此,选择此一论题首先是有助于填充这方面学术研究的盲点,具有一定补阙意义。

其次,尚未见有专门对西方人记述福建社会的作品进行系统地搜集和整理,笔者希望能在在这方面作出一些努力和尝试:即以传教士为中心主线,尽可能全面地查找和搜寻近代西人记闽之著述,以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这方面资料线索。

第三,对以传教士为主的晚清西方人群关注、记述和报道福建社会文化的内容、特点、他们怎么看福建(如何建构其“福建印象”)以及体现出何种心态?等等,还鲜为人们所知。借助来闽传教士群体的著述及相关文献,可以爬梳出基本的内涵与体系。这亦是一项具开创性质的工作。

第四,西人著述对于福建地方史研究的资料价值,尚无专门的挖掘和探论,

^① 林金水、谢必震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绪论”第15页。

^② 美国著名汉学巨擘费正清先生曾有一段精辟论述:“就19世纪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而言,新教传教士仍然是研究得最少、但又最为重要的角色……只有他们寻求改变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他们对中国人的生活渗透得最深,在所有外国入侵者中他们在地方事务中的介入最深。同时,为了维护国内赞助者的支持,他们还是在外国人中最全面地——如果也是有选择地——向西方公众报告中国情况的人”。(见《费正清集》,陶文钊编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我国学者周振鹤教授也言:“晚清以后,商人与外交官的活动显著加强,但传教士来华的活动更加公开也更加深入,其影响程度依然远在外交官与商人之上”(《〈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丛书序”),等等。上述说明,传教士群体因特殊的使命和目标,他们对中国的考察、认识、审视与报道更为犀利和不遗余力。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于福建,来闽传教士群体不仅活动范围广泛和持续深入,他们所书写的著述在数量与质量方面,都是十分突兀的。

^③ 目前为止,笔者仅见在林金水、谢必震主编的《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中辟有一节介绍“西方人对福建的记载与介绍”,此节主要为概括性地提供了基本的研究线索;朱峰《传教士麦利和与清季福建社会》专辟一章“麦利和眼中的福建社会”进行专门介绍;林立强所著《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州社会》(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和《晚清闽都文化之西传:以传教士汉学家卢公明为个案》(海洋出版社2010年版)二书对卢公明所记述的晚清福州社会事象进行过介绍和分析。

此项工作也有待开展。福建地方文献资源十分丰富,但无法脱离闽人主观视野的局限性,西方传教士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待问题,无疑具有一定客观性意义。他们同样“阵容庞大”的著述群及相关材料正好可与中文史料参照使用,互补互证,颇有一种“二重证据法”之意味。同时,这些西人著述和西文文献也有助于了解晚清之世福建社会文化最常态化的表征,能够开拓史料的来源。

第五,有助于深化西方人中国观研究的内涵。当前对西方的中国观研究蔚为热门话题,但基本都还停留于宏观层面的考察或资料译介工作上。本书选题尝试从微观的区域社会角度对晚清西人中国观(区域社会观)进行考察,以期丰富该领域的具体案例。

第六,对于中国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层面的意义。以往学者在此领域偏重于从宗教传播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西学东渐”层面进行论探,而对于“东学西渐”则相对薄弱。本书试以区域史视角勾画传教士传播“东学”的具体案例,分析他们构建的地方社会形象。

二、学术史回顾

本书之选题虽尚无专门系统研究,但前人的学术探索业已积累一定的研究基石,对于本书写作不无裨益。

20世纪80年代,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学术界对福建基督教史研究开始起步。福建师范大学已故教授陈增辉先生的《福建基督教史稿》(未刊)为我们奠下福建基督教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提供了基本的线索,该书以差会为主线,分述各来闽差会活动情况,并按专题介绍基督教教育、医疗、出版、慈善等事业,体例完备,惟因此书为草稿,错误之处不少。1992年陈支平、李少明撰写的《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一书从近代基督教传入福建后与民间基层社会关系角度入手,探讨了基督教与福建民俗、乡族势力的冲突、糅合,较早地从区域史视角分析基督教于福建社会的传教活动;1997年,林金水、谢必震教授主编的《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六章叙述近代基督教传入与西方文化对福建社会的影响,辟有一节“西方人对福建的记载与介绍”,这不仅是本书写作的动机之一,也为本书提供了基本的研究主线;朱峰博士的硕士论文《传教士麦利和与清季福建社会》(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8年,未刊稿)一书以清末来闽美国传教士麦利和为研究对象,探索基督教与晚清福建社会关系,该书专辟一章“麦利和眼中的福建社会”,对传教士如何看福建进行初步的介绍,朱峰博士另一著作《福建基督教史钩沉》(香港:汇美传意,2002年)和林金水教授主编《福建基督教史初探》(台湾:宇宙光,2006年)也提供了这方面的相关信息。

国外学者对福建基督教问题也不乏关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于1974

年出版的《福州教士》(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①一书,是西方学者比较集中研究基督新教在福建传播历史的开拓之作,该书以晚清来闽传教士的活动事迹为考察线索,涉及传教士与福建地方社会关系等问题,因为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作者没有能够引用相关的中文资料,他的研究不可避免带有片面性。2001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日安博士(Ryan Dunch)所著《福州新教徒与现代中国的形成》^②一书是北美学者研究福建基督教的一部优秀著作。唐日安曾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唐还是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作为访问学者在福建师大历史系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他在福州参阅了许多珍贵的中文文献,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突破了以往学者偏重外国传教士活动的局限,而关注到福建教徒群体的研究,该书对基督教与转型时期福建社会关系所做考察部分,对本书写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西方传教士的“福建观”,即他们对福建社会文化的介绍与传播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2005年,林立强教授《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州社会》出版,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书中对于卢公明所记述的福建社会事象进行专门论述,对于本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最近,林氏另一部大作《晚清闽都文化之西传:以传教士汉学家卢公明为个案》也在海洋出版社出版(2010年),该书是目前对西方传教士引介福建社会文化最为系统丰富的一部专著,作者依然是以传教士卢公明为个案,对卢公明所记之闽都文化的内容进行论述,还未上升到传教士群体研究的层面。

从研究生招生开始至今,在对近代福建基督教史研究过程中,福建师范大学高时良、林金水、谢必震教授等门下弟子进行了大量的基础性开拓工作,他们从差会、地域、人物或专题等视角写成了一篇篇专门的博硕士论文^③,这些都为本书写作提供了研究的参照。

综上所述,当前在福建基督教史研究领域,虽然现有成果颇为丰富,但对

① 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② Ryan Dunch,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其中代表性者如陈名实:《福建省基督教教会学校教育初探》,1988年硕士论文;李颖:《耶稣拯救中国:伦敦会传教士麦嘉湖研究》,2003年博士论文;陈林:《近代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事业之研究》,2006年博士论文;张金红:《胡约翰与福建安立甘会研究》,2007年博士论文;卢平:《基督教与闽西客家社会》,2002年硕士论文;王福梅:《莆田基督教会(新教)之研究》,2002年硕士论文;张钟鑫:《本土化与信誉重建——泉州地区基督教会研究》,2003年硕士论文;周典恩:《福建新教教会医院之研究》,2004年硕士论文;赵广军:《“上帝之笈”:信仰视野中的福建基督教文字出版视野之研究》,2004年硕士论文;李双幼:《近代闽南基督教会研究》,2006年硕士论文;吴巍巍:《基督教与近代闽北社会——以美部会为考察中心》,2006年硕士论文;崔军锋:《民国时期福州基督教慈善事业研究》,2006年硕士论文;陈明霞:《近代福建基督教中学教育模式研究》,2006年硕士论文;陈新:《教会大学与近代福建社会》,2008年硕士论文等。

于西方传教士群体对福建进行报道、考察的著述活动研究还显薄弱,对于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福建社会文化的整体关系及传教士的群体文化观照,还缺乏全面的梳理和系统的阐述。此一现状,正是本书力图作出突破的缘由。

若从更宏观视野来看,本书选题归属于晚近以来“西方的中国观”这一研究领域,出于对本书写作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运用等方面考量,故有必要对该领域已有研究成果与现状等作一番回顾和考察。

学术界对西方的中国观(或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认识,总体上比较倾向于认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一道分水岭。18世纪末叶以前,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基本上是钦慕、赞叹、肯定甚至美化的,从马可波罗游记到明清耶稣会士报告等,莫不如此;而在19世纪后,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论调猛然来了个大转弯,开始转向以负面报道为主流的认识期,尤其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臻至高潮,东方中国形象在他们眼里显得破败而落后不堪,中国不断遭致西方人的蔑视、否定和丑化,从美好理想的王国变成了“野蛮”的“异教国度”,沦落为殖民话语肆意欺凌的对象,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首先明确的概念与观点。

从国内学界来看,对西方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之研究首先是从介绍性工作开始的。例如,忻剑飞的《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学林出版社),该书出版于1991年,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世界认识中国及其中国观内容的历史过程,偏重于整体介绍,对近代西方人中国观有初步论述但未作深入探讨;同时期还曾出版一部作为爱国主义教育丛书一种的《外国人的中国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是一部介绍性通俗读物,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历史上外国代表性人物对中国的认知(晚近部分亦很简略);等等。

继上述介绍性著述之后,关于此一领域的丛书译介工作相继开展,并一直持续至今。1997—199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黄兴涛和杨念群教授主编的“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丛书付梓出版,该译丛由时事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相继推出过十种著述,并于2006年由中华书局首次以十部汇齐方式,以《“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为名修订再版^①,这是译介近代西人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之研究工作至今仍具重要影响的著作群。此后,以西方的晚近中国形象(中国观)为主旨的翻译丛书不断问世:200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外人眼中的近代中国”丛书;同年,张鸣、吴静妍主编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1—8卷)这一资料译编付梓(吉林摄影出版社),该丛书从外国人

^① 这十部著作分别为:[英]约·罗伯茨的《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美]M.G.马森的《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西方的中华帝国观》)、[美]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美]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美]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素质》(全译本))、《中国乡村生活》、[英]麦嘉湖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雷蒙·道森的《中国变色龙》、[美]E.A.罗斯《变化的中国人》、[英]立德夫人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眼中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国民性、风土人情、革命与变革等专题分8卷13篇引介西人对华认识,跨近代至现当代,摘引译介了众多近现代西人言论;2004年,由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主编的“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首次推出关于新教传教士先驱或著名人物马礼逊、卫三畏和丁韪良三人之传记性著作,新近又出版李提摩太在华事迹介绍、首位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的传记和著名教育传教士狄考文的传记^①;2006年,南京出版社出版了由张子清教授主编的“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2007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又推出由李国庆与耿昇主编的“亲历中国丛书”(包括《帝国丽影》、《五口通商城市游记》等7种,多为近代西方人作品),等等。应该看到,这些译介工作的推展,表明我国学界对西方中国观这一课题的兴趣不断升温、不断取得突破。这些,为学者的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近年来,与本书选题较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进路主要集中于三大领域:第一,对晚清(近代)来华西方传教士中国观(或者说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论述与认识)的研究;第二,比较文学视野中之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第三,具体到近代某个西方国家、甚至某一西方人物所生成的中国形象问题和以“西方人看近代中国”为主题的通俗性或学术性作品。

第一个领域,也是与本书主题关联最紧的研究路径,有关成果颇多。例如,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书论及传教士对中国政治、教育与文化等方面认识,并试图以基督教文明之力加以改造,王氏还撰有《试论美国人中国观的演变(18世纪—1950)》(《世界历史》1998年第1期)一文,分期段系统梳理了美国中国观;吴梓明、陶飞亚在《晚清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文史哲》1997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晚清传教士不仅注意到了中国的古典文化,而且也留心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他们不仅看到了帝王将相,而且把目光投向了平民生活。他们人数众多,来自不同的国家,用不同的眼光看中国。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新教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专辟一章详细探讨早期欧美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问题,内容颇为详实。王立诚《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关于文化间接触和感知问题的一项个案研究》(德国马堡科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还以德文的方式于国外出版,该书试图通过研究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报道和由他们所反映的中国图像,深入考察殖民扩张和现代化时代

^① 此几部传教士传记分别为:《马礼逊回忆录》、《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丁韪良的《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2004年);《李提摩太在中国》(2007年);《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2008年);《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2010年)。在这些人物传记、回忆录中,有大量的内容涉及作为传教士的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见解,反映了他们的中国观问题。其中丁韪良的《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一书对福建还有专门的记述片段。

西方社会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估,剖析东西文化接触的历史经历,批判西方社会的文化霸权;揭示中西文化交流和营造世界新文化的合适途径^①。对此,王立新教授还提出,萨义德等提出的后殖民理论研究视角和解释框架,作为今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其中传教士对中国的话语书写和认知语境是其中核心内涵之一^②。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基督教在中国:比较研究视角下的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刘树森编,2010年版),该书第一部分即以“中国形象”为主题,其中收录“19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视阈中的中国形象”一文,表明此一研究路向已成为学界积极关注的话题,等等。这些研究的力度,已大大超过以往的介绍性文著。

第二个领域是近年来文学工作者涉猎最多也最深的领域,可以说是成就斐然、成果迭出的热门“显学”^③。这一领域内,北大乐黛云、孟华教授和厦大周宁教授是其中领军代表。乐黛云是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的开拓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探索西方文化对中国的认知及比较视野观照,曾主编《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和《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1998年与法国学者阿兰·李比雄合作,创立了《跨文化对话》期刊,至今已经出版20多辑,是反映国内外跨文化研究最新成果的交流平台。孟华是留法学者,致力于对西方形象学理论的引介和构建本国化理论的努力,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一书系统译介法国学者巴柔等人形象学理论,并提出自身阐释进路,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意义,其中“文化形象”、“集体想象物”、“我”与“他者”等概念广受学界关注和引用。周宁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学界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其宏著《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一书以大量西方文本资料为基础,建构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阐释体系框架,辨析出西方中国观的历段分期和核心内涵,并颇具创见地提出“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历史中生成的有关现代性‘他者’的一整套规训知识、发挥权力的表述系统……黑暗的中华帝国形象将中国确定在对立面的、被否定的、低劣的位置上,这为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提供了必要的意识形态”等观点。其有关著述颇丰,还编著了《2000年西方看中国》(团结出版社1999年)、《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等一系列著作和论文等。姜智芹《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一书也是近年形象学重要著作之一,作者运用后殖民理论

① 参见蒋锐:《“他者”的映像——读〈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王立新:《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这一观点亦是文学工作者所提倡的视角和思路,参见周宁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与中国形象研究》,《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

③ 有关研究综述可参见杨秀媚:《“他者”眼光下的自我言说——近年来国内有关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分析》,《宜春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马婷:《他者镜像中的中国主体——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述评》,《学术研究》2007年第10期等。

和东方学,揭示出英国文学中对中国的形象和利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反映了英国当时的社会性质、特征以及所欲解决的问题^①。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近代以来西方表述和审视中国所存在的“话语霸权”、“殖民文化观”、“他者的语境”等表现及其缺失,并力图提出一些具有创见性的理论阐释。

在第三个领域中,当前文史学界工作者亦较多地将研究视野和取向投置于此。例如,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一书,该书系统考察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历史进程,简要涉及传教士的中国研究;又如在2005年前后,国内学界对近代史上重要的西方人物——莫理循的中国观之研究取得相当成果^②。在专题研究之外,“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亦是通俗著作青睐的课题,颇受研究者的欢迎,并涌现出相当多图文并茂的作品:如徐有威主编《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解本亮的《凝视中国——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民族出版社2004年)、华少庠《冲突与融合:图说世界格局中的晚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沈弘编著的《晚清映像——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等等。

近年来,有关晚近西方传教士的中国观研究还是博士研究生的热门选题,如崔丽芳《被俯视的异邦——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著作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马少甫《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观和中国学研究——以裨治文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大博士论文2007年),倪文君:《西方人塑造的广州景观——以旅行者、传教士和使团成员记述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翁伟志《他山之石:明恩溥的中国观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晚近西方的中国观(中国形象)问题还常常与海外汉学发生纠缠混绕,二者关系颇错综复杂,限于篇幅,这里不具体展开^③。

与国内学界研究的从蹒跚起步到大踏步前迈之情况相比,海外(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在晚近西方的中国观、中国形象研究这一领域上开拓较早,并构建了诸多理论之阐发和解释的构架。其中不少理论、方法和观点,至今仍对我国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

西方学界对近代中国形象问题的研究从民国时期就已初现端倪。著名教会史

① 姜智芹:《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② 沈嘉蔚编撰、窦坤等译:《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三卷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戴银凤:《莫理循的中国观》,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未刊稿。

③ 可参见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关于形象学学科领域与研究范型的对话》,《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